

张 洁 著

大世界丛书
中国作家看外国



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

YIGE ZHONGGUO NUREN ZAI OUSHOU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大世界丛书（中国作家看外国）

一个中国人 在欧洲

CHONGGUO

YOUZHOU

张 洁

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

张 洁 著

*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76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125印张 3插页 130千字

1989年4月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80074-057-9/I·42

定 价：2.95 元

序

在与世界隔绝了 30 年后，我们终于有机会走出家门，去看看外部的世界。“放洋”一圈归来，对西方世界仍是不甚了了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在学校读书时，只能读俄语。而那点可怜的俄语，也因 1960 年后中苏两党交恶，始终得不到实践的机会。我 20 多年没见过苏联人，更谈不到经常应用，使之巩固。渐渐地，我连字母也认不得了。

至于英语，还是念小学的时候学过几天，父亲、母亲、你好、再见，A、B、C、D 等等，跟本无法与西方人交谈，事无巨细都要通过翻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都会失去深谈的兴趣。已经把翻译累得口干舌燥，再请他们为半疯的文人的半疯的交谈提供服务，是否太不人道？

虽然半疯的文人自视极高，却不得被越来越物质的世界所排斥，呈穷途末路之势。知音者，日渐寡矣。

也曾有过要补英语的打算，无奈早已到了健忘的年龄，一个单词上午还记得一清二楚，下午就忘得一干二净。就算缀笔专攻英语，顶多闹个问路、寒暄、换乘飞机的标准，要想随心所欲地进行思想交流，这辈子怕是没有那一天了。

目 录

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	(1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访美散记

库特·冯尼格说:NO!	(169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我不后悔到纽约去.....	(17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在杨伯翰大学讨论《红字》.....	(186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金斯伯格,你将怎样呢?	(194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“嘭?”“NO 嘭!”	(200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保尔哭了.....	(217)
-----------	-------

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

一、他们也是我研究的对象

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变成一道滋味儿难辨的杂和菜的柏林——确切地说，是西柏林，到了。

我走出机舱，迎面碰到的是史宾格朗架在肩上的摄影机，一挺重机枪似地瞄着我。在他身旁，还有一位助手，举着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人的放大照片，以“验明正身”。

我很不自在，差点用手把面孔挡起来。因为那场景很象克格勃被驱逐出境；或一大宗海洛因走私案被破获；或策动某起政变的嫌疑犯被法院提审的非常情况。

除了我们本人，他还拍了出现在行李传送带上的中国作家的人造革提箱。比照作家的身份，人造革提箱可能不那

么讲究,不过它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免费借用的。

根据我们的经验,一个人,只有在成为至圣先哲之后,他用过的一个勺、或坐过的一张椅子,才会花那么多胶片拍下来供后人膜拜和追念。如此这般,只能说明联邦德国的大众传播媒介,对中国作家能够前来参加西柏林“地平线”艺术节的重视。

除“艺术节”的工作人员外,3月份在北京一同开过会的诺瓦克,彼德·施奈德,以及我的《沉重的翅膀》一书的译者——阿克曼也来机场迎接。

王蒙,我,和他们3人,同乘施奈德的汽车,前往下榻的旅馆。汽车由阿克曼驾驶,施奈德因酒后开车,刚刚被警察吊销了执照。

阿克曼开车,如理发师推头,用了一把不好使的推子。理出来的头发,如俗话所说——和狗啃的一样。他的刹车,频繁而突然。每次刹车,众人都要猛地往前一栽。他解释说,他在上海工作了两年,很久没有开车了。阿克曼前我们一天,乘别的航班到达西柏林。他不敢与我们同乘CAAC航班,据说这次发给他的翻译奖,奖金只有5000马克。而CAAC的往返机票,不但比其它航空公司贵出许多,还很难买到。

CAAC的机票可能比某些航空公司贵,但机上的供应却慷慨大方。空姐送过一次之后,几辆饮料车,就分别停放在A、B、C舱之间,由乘客随意自取。不象别的航空公司,始

终由空姐殷勤备至地送到手上。那样一来，你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障碍，总不好意思让她一趟又一趟地为你服务吧。尽管你清清楚楚地知道，一切费用，都已包括在机票之中。CAAC的耳机，也是免费使用，泛美公司的耳机，则需租用。

红灯。我们大家又往前裁了一下。在等绿灯的时间内，我浏览街景。西柏林夜生活的时间，可能比联邦德国任何一个城市都长，大约持续到午夜后的一、两点钟。此时只有11点多，街上自然灯火通明，人们的游兴正浓。相距不到一米的人行道上，有一个男青年，探头躬身地往我们的汽车里张望左右。我以为他认识我们之中的谁，找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谁知他这样张望之后，便转过身去，在一棵树下，以一泻千里之势撒了一泡尿。我记得在美国随地大小便是要罚款的。西柏林不么？我不明白，既然他如此地痛快淋漓，又何必往我们的汽车里瞧呢？噢，也许他在瞧车里有没有警察。我差点将我的惊讶表示出来，但车上的人，个个泰之若素，我立刻噤声不语，否则便显出我的教养之差。

很快就到了旅馆。大厅及酒吧都很富丽，住房却比不上北京的建国饭店，价钱可不含糊。阿克曼说，他只能在这个旅馆住两个晚上，房租太贵，明天就搬到朋友家去。阿克曼用钱一点也不小气，可以说比我见到的好些洋人都大方，都慷慨。

安顿好行李之后，和诺瓦克、施奈德、阿克曼、史宾格朗在旅馆的酒吧里聊天。

“我们离开北京之后，你们在背地议论过我们吧？”施奈德问。他有一张令人感到可亲的，象农民一样结实的脸。

“没有，不过我说过这种会议，只能使我们之间的了解，停留在一个非常表浅的层次上，倒不如有机会多作个人的接触，也许还能就我们个人的创作，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。”我反问：“你们背地里议论过我们？”

只见诺瓦克和施奈德，激烈地交谈了几句。阿克曼说：“倒是他们之间，背地里互相议论很多。”

我理解。天底下文人的习性，大致都差不多。

施奈德对我说：“不过我和你吵过一架。”

“是吗？我没有这样的印象。”也许我和人吵架吵得太多，吵得太大。也许他把一般的辩论当做了吵架，总之我一点也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情。

“那好，我希望永远不要和你吵架。”

怎么会呢，那样朴实而诚挚的施奈德。

将近 20 个小时的旅行，使我精疲力竭，可是我们还是谈到午夜一点。和外国朋友相识，能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，似乎就有老朋友的意思了。本以为在西柏林的期间，可以和在北京会过面的德国朋友，多一些相处的机会，但是第二天一睁开眼，我便身不由己，被各式各样的记者，切成碎块了。

我至今仍感遗憾，给我和诺瓦克，布赫，施奈德，阿诺尔德，库宾相处的时间太少了。

就是在不多的几次相聚中，也因为白天的过度疲劳，或

东西方人的不同习惯，而终于未能畅谈。

如联邦德国著名的评论家阿诺尔德，作家施奈德，以及阿克曼请王蒙和我等人在饭店吃晚饭时，刚刚谈到一些大家有兴趣的问题，如稿费、读者来信（其中有无求爱的人？）、性文学（他们也认为这没什么意思）、作家当官后的苦恼等等，我却在席间睡着了。这显然败了大家的兴。阿诺尔德见我困得实在可怜，便建议聚会到此结束。我上了回旅馆的汽车，睡得更沉了。直到下了汽车，跟在王蒙后面，走进旅馆大门的时候，似乎还未醒来。我迷迷糊糊地只管跟着他走进一格只能装一个人的旋转门，结果脚被门框狠狠地挤了一下，才把我从瞌睡中彻底挤醒。但是一上床，又沉沉地睡了过去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才发现脚背上挤出一块青斑。

还有一次，施奈德，阿诺尔德，布赫等人在施奈德家中，准备了一次盛大的晚餐，招待中国作家代表团，同时还请了西柏林文艺界的不少名人作陪。刚刚吃完水果，中国人却起身告辞了，而有些客人才刚刚来到。他们是特别为了饭后的交谈——这个更有意思的活动。虽然施奈德极力挽留（你知道，西方人的极力，并不具有令人无法摆脱的粘劲儿），大多数人还是走了。事后施奈德以为这煞费苦心的晚餐，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，我们解释道，在中国，宴会进行到上水果的时候，就表示到此结束了。

说这些，并无半点抱怨记者的意思。

一个缺陷，也往往带来另一个补偿。

记者们会不会知道，当我成为他们笔下的人物的同时，他们也将成为我笔下的人物呢？

记得在西柏林接待两位从奥地利电台赶来的记者时，曾稍稍地流露过这样的意思。他们有些惶然地问：“你会把我们写得很坏么？”

怎么可能这样呢？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请看看吧

6月12日晚上，联邦德国驻华文化参赞海顿先生，在家里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西柏林之行，举行招待会。

客厅不大，25平方米左右。与会者40余人，后背和后腰，时不时地会被别人的胳膊肘，或是服务员手上的托盘，杵上一家伙。

好象中国女人坐月子，通向阳台的门窗全都关着，冷气也没有开。40多个人，每个人都是一个散发着一小热量的小火炉。客厅简直成了一个闷罐车，人们不断地出汗，擦汗。

就在这客厅中间，有一块又高又大，蓝白条相间的衫衣的后背，被汗水濡湿了。倒回40年，我准会跳上去，摸着那块背，跳着脚地喊：“噢，背湿喽，背湿喽。”不必解释，那是我小时在关中平原学会的骂人话。

人多，每个人都在说话，便感到听得吃力。于是人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以致把耳朵塞到说话人的嘴巴底下，也

难以听清对方的话。

有人扬声大笑，其声嘹亮如母鸡下蛋后的欢唱。

海顿先生大概站累了，一面和人谈话，一面象运动员投入训练前做准备活动那样，扭动着腰和胯。

我在犄角里，找了张椅子坐下。不一会儿，那位湿后背，满脸是汗地在我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。

问过了我的姓名之后，他用中文说：“噢，我知道。”

“您贵姓？”我问。

“瓦格纳。”

“好记。”我想到了作曲家瓦格纳。

“不过和那个瓦格纳没有什么关系。”他的脑子很快，一下就跟上了我的想法。

我注意到，他领带上的结子，已不在喉节下老老实实在呆着，而如项链上的坠子，悬挂在胸口。他用食指挑了挑胸前的“坠儿”，说：“这个东西，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你何不取下来呢？”

“可以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可以呢？”

我还没看清楚怎么来、怎么去，他脖子上的领带，一瞬间没有了影儿。

“我不喜欢这样的招待会，站着，吃一点儿、吃一点儿，没有什么意思。我喜欢坐着，正正规规地吃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又补充说，“我的中文不行了，我刚从日本回来，在那里呆了

10年,只说日本话。”

“你在日本有何公干?”

“记者。我是《法兰克福汇报》的记者。”

“你喜欢日本,还是喜欢中国呢?”

“我喜欢中国,不喜欢日本。”

有了前面的接触,便知他这样说,并不是因为面前坐了一位中国人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日本人很有礼貌,可是很难和他们交朋友。在中国,可以交到朋友。”

“你在中国有朋友吗?”

“当然。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,和我同宿舍的杨,就是我的好朋友。他常常批评我,”他挥动着粗大的拳头,做了一个出击状,“还这样。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,我正在找他。”停了一会儿,他又说,“等你回来,我们谈谈文学好吗?”

在我回答别人一句问话的当儿,他象他的领带那样迅速地消失了。

回国之后,我又见到了瓦格纳,但是他并没有和我谈文学,而是大谈外交公寓的耗子。

“我刚搬来的第一天,房间里除了一部电话,什么家具也没有。那天晚上,我正在打电话,房间里的灯也没有开,我看见有一团黑东西,很快地向我窜来。我猛地一跳,让过了它,它钻进墙脚,不见了。”上面的每一句话,他都象演活报

剧那样，用动作表演出来。“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一只老鼠。每天晚上，它在我的书房里啃我的稿子。”他侧过头，用右侧的虎牙，做啃噬状，并发出“咔吃、咔吃”的声音。

可以想见，这是一只对新闻业很感兴趣的耗子。

“有一天我看见它跑进了厕所，立刻把厕所的门锁了起来。我在门外，一会儿开灯，一会儿关灯；又拿了一个闹钟放在门外，让闹钟时时大响；过一段时间，便用力地敲一会儿门。”这些，无一不用一个动作加以说明。“3天之后，它死了。”瓦格纳胜利地大笑。

“不，我想它还是因为喝了我的一瓶香水，它把香水瓶子打了。”瓦格纳太太说。

瓦格纳说话时，表情、手势、动作都很丰富，嗓门也大。我觉得他更象个美国人，而不象德国人。

他信口抨击我们提到的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，当然都不是中国的。我不知他如何进行采访，倒好象他时时在接受别人的采访，非常乐意地，滔滔不绝地表示着自己的意见。

瓦格纳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记者。

我始终尊敬记者这一职业。

记者的工作和现实生活贴得太近，职业要求他们比作家具有更直接的献身精神，不论他们的肉体，抑或他们的人格。

美联社曼谷9月9日电，美国记者尼尔·戴维斯在泰

国政变的激战中被打死。虽然电文进一步解释了戴维斯被打死的原因和过程,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悲壮的事件,美联社却用了“被打死”这样一个口语化的词句。如果使用我们的新闻语言,会说“他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”。

在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节目中,我看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显然是已经躺在血泊中拍下的,泰国未遂政变中的一些镜头:许多模糊的、摇晃的、却又在狂奔的腿和脚。戴维斯不但给这个动乱的世界,又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实地资料,同时也留下了他自己。

戴维斯用生命换来的那些资料,随着时间的推移,时局的变幻,很快地会失去它的价值。新闻,新闻,新的时候,方才可闻。时过境迁,变成了老闻,谁还希罕呢?但是戴维斯的职业献身精神,不仅会为他的同行们长久地追忆,也会让一切认真的人,沉思默想上许久。

尼尔·戴维斯让我想起在联邦德国采访过我的北德电视台记者采尔科先生。不过他好好地活着,我回国时,他已去他的“别墅”休假。

他的“别墅”来之不易。全部费用来自他的一笔稿费。这笔稿费是他在阿富汗拍摄“重大题材”——苏军入侵阿富汗——的报酬。算他走运,没有遇到尼尔·戴维斯的不幸。

世界总不太平,每天都可以在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节目里,听到枪炮的轰鸣,看到流血和死人。这些实况谁拍的?还不是各地的记者。这笔钱不好赚呐,是真正的血汗

钱。

所谓的“别墅”，建在爱尔兰附近的一个小岛上。岛上，连采尔科家在内共有两户人家，8口人。逢到涨潮的时候，海水就把他们和陆地隔绝了。“但是保证有土豆吃。”他说，“平时我们就捉鱼、海蟹和龙虾吃。将来如果你有机会访问爱尔兰，一定告诉我，我请你到我的别墅里去写作，绝对地安静。”

以上是他采访我时，我对他的反采访。我从不甘心做一个等着挨板子的被采访者。

到西柏林的第二天早上，我还坐在旅馆的餐桌旁，他就来了。瘦高的个子，一副近视眼镜架在同样瘦长的鼻子上。蓝毛衣外面，套着一件灰褐二色交织的西服上衣。

我们驾车沿着 AVOS 高速公路，去万塞湖畔“拍戏”。这条公路在二三十年代，是供车赛用的跑道，现在有一丝被废黜的荒凉。我们的车后，紧跟着一辆面包车，上面装着他的助手和摄像器材。

高大的橡树，巨人般地环抱着万塞湖。壮美的树冠，在风中摇摆出浑厚而低沉的吟唱。德国人常以橡树做为德国民族的象征，正是因为它的身躯，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袭击。

湖畔的“沼泽”饭店，是仿巴伐利亚风格的建筑，木顶白墙，窗前、阳台排满了红色的绣球花。房椽的一头，装饰着一个鹿头。一劈两半的木桩子挖空了，架在房前的空地上，里面栽满各色艳丽的花朵，使人有来到阿尔卑斯山区之感。

太阳时隐时现，捉弄着我们的摄影师。他较真儿得厉害，时时地停机，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重来。采尔科尽力想要使我不觉得厌烦。

“从前，凡是悬有鹿头的地方，就是猎人们聚会的场所。现在鹿头已经成为纯粹的装饰，还有人开玩笑说，这是被欺骗的丈夫们聚会的地方。”

“万塞湖附近发生过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”我以为他要讲一个神怪的故事给我解闷。“二次世界大战时，纳粹们在这里召开过一次会议。就在这次会议上，他们决定消灭犹太人。”

橡树林还在云的暗影下，安详地摇曳着。它的绿色，也显出难以看透的幽深。我无法把这样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和这个美丽的地方联系起来。

太阳终于出来了。采尔科高兴地说：“我们这里一直下雨，是你带来了太阳。”米歇尔·阿克曼则说：“你是巫婆，把太阳叫来了。”

可是我们仍旧时拍时停。或是因为风太大，橡树不肯安静，从低吟变成激越高昂的喧哗。录音师说，如此这般，我们的对话录音效果就会很差。或是因为摄影师要等湖面上有帆船驶过，使我们谈话的背景，更漂亮一些。难怪他们这样的认真，后来看过这套节目的人对我说，景色和效果都是好极了。因为忙，我自己却错过了播放的时间。

我在风中瑟瑟发抖。采尔科脱下他的西装外套给我穿